

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

何萍

【摘要】意识形态有理论功能和价值功能之分。意识形态因其价值功能而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挑战了原有的价值观念,使意识形态的理论功能和价值功能之间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表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微观世界的文化革命,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和意识形态创新的契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市场经济;当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 D0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06)01-0037-07

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实行全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意识形态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中国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这个问题的提出直接挑战了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学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在意识形态上否定马克思主义,要求以当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或传统儒学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这就造成了意识形态研究领域的复杂局面。这种复杂,是由于中国的学者对意识形态本身缺乏理论和实践的深入思考,只是简单地把某种现有的意识形态框架套用于中国当代社会。就马克思主义来说,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意识形态,没有区分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与功能,自然也不能从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与功能的变化中找到意识形态的创新点;就自由主义来说,我国主张自由主义的学者只是简单地搬用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却没有看到意识形态的民族特色,不了解即使同样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不同的民族,市场经济的形式也绝不会完全相同,而体现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也必然会有自身的民族特色;就新儒学来说,倡导以儒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最大误区是忽略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发展和当前市场经济改革的现实,没有看到意识形态的时代特征。这些理论研究缺陷表明,中国意识形态的问题最重要的还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而是理论的问题。理论的问题只能靠理论本身的创新来解决。为此,本文力图在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结合上,探讨意识形态的理论结构与功能,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与现实。

一、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功能

从理论构造上看,意识形态有内在结构与外在结构之分。所谓内在结构,即是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所谓外在结构,即是意识形态与社会形态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意识形态就是这两种结构的有机整体。研究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就是要了解意识形态的

作者:何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

内在结构与外在结构的内容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当代的意识形态研究中,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通常是通过哲学和意识形态的讨论展开的。在哲学与意识形态的讨论中,哲学被定义为一种知识体系,因而是以理论,或科学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而意识形态则被定义为社会的价值体系,因而是以人们的信念,或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在哲学史上,知识性是与实证性、非批判性相一致的,而价值性是与思辨性和批判性相一致的。由于这一规定,那些主张哲学的知识性和科学性观点的哲学家们,坚决反对把意识形态纳入哲学研究的视野,要求区分哲学与意识形态,以保持哲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譬如,克罗齐主张分立形而上学与意识形态,是为了建立历史的形而上学,从而把政治排除于哲学之外;阿尔都塞主张区分哲学与意识形态,是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之不同,那些主张哲学的思辨性和批判性特征的哲学家们则要求把意识形态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意识形态的辩证法,突出哲学的人本主义特性和政治功能。譬如,葛兰西、卢卡奇、柯尔施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都对意识形态作了深入的研究。这两派哲学虽然对哲学和意识形态的理解非常不同,但在把哲学规定为理论体系,意识形态规定为价值体系上,则是一致的。正是这种一致性呈现出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即理论功能与价值功能、科学性和政治性的有机统一。由于这种统一,意识形态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批判性。相反,如果某种意识形态不同时具有这两种功能,这种意识形态就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这一观点早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就已经明确地提出来了。马克思曾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公开宣布“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p15]}马克思在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说明自己的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关系,宣布自己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时候,实际上指出了哲学不仅是理论,它还同时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列宁在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力图把阶级的意识排除于经济的过程之外,只是貌似客观,相反,只有把阶级意识与经济过程的考察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客观主义。可见,把意识形态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强调意识形态是理论功能和价值功能、科学性和批判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有的品格。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如何看待意识形态的理论功能和价值功能及其相互关系。

一般地说,意识形态的理论功能是指意识形态选择什么样的哲学理论,或者把什么样的哲学理论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是指哲学理论为意识形态提供价值取向。所谓哲学理论为意识形态提供价值取向,就是把哲学理论的内在精神和哲学的理想转化为一种价值系统,影响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世界,体现哲学理论改造人的作用。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现实发生作用,必须通过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于是,价值功能就成为哲学理论对现实起作用的中介,如果抽掉了这一中介,把哲学理论直接运用于现实,就会把哲学基本理论变成指导一切、裁决一切的根据,这是哲学走向教条化的根源;同样地,理论失却了价值功能,也就失去了与活生生现实的联系,失去了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哲学理论僵化的根源。可见,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既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调节器,也是激活理论发展的动因。一种意识形态与基础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它在社会结构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起什么样的作用,都是通过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表现出来的,不仅如此,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的理论选择和创造,也主要是依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确定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是打通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与外在结构的环节,因而是比之意识形态的理论功能更为重要的方面。

在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研究方面,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值得借鉴的。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尽管与人们的价值系统相联系,属于市民社会、文化领域的问题,但是,人们依然可以依据意识形态与基础的关系把意识形态区分为有机的意识形态和随意的、理性化的或“被意愿”的意识形态。有机的意识形态与特定的基础相联系,是这个基础的意识。这种意识形态能够有效地组织人民群众,把广大群众吸引到新文化运动中来;随意的、理性化的或“被意愿”的意识形态是抽象的意识

形态,是特定个人的随意的苦思冥想。这种意识形态只创造个人的运动,绝不能组织和吸引广大人民群众。根据葛兰西的这一思想,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虽然体现着人的主体性,但却不是随意的,而是以其内在的知识为根据的,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发挥的程度以及它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恰恰取决于该意识形态反映基础、揭示基础的内在矛盾的深刻性。这就把意识形态的知识性、科学性融入了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之中,一方面以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作为尺度,衡量意识形态与基础的关系,判定意识形态的有机性,另一方面又以意识形态的知识性而把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提升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作为哲学获得其批判功能的根据。

历史地看,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进入哲学的研究视野常常发生在中国社会变革时期。因为,任何社会变革都必然改变人们的传统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于是,在社会变革时期,一方面是普遍的价值危机,另一方面是新价值体系的创造。这种新旧价值体系交替杂陈的状况使人的价值、信仰问题变得分外突出,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也由此而成为哲学研究的主题。反之,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和平阶段,人们的价值体系处于相对稳定状况时,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常常被遮蔽起来。这时,人们更关注的是意识形态的理论功能。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意识形态的研究,是中国进入全面市场经济建设、人们的价值观念急剧变化的理论反映,其研究的重心也自然地落在了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方面。

二、中国意识形态的民族性特征

任何价值系统,总是一定民族的文化观念和行为习惯的规范,因而也是该民族的文化。然而,任何民族文化、民族的价值系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通过不断地构造新的意识形态,创造新的价值系统,呈现出时代的变化。由此决定,任何意识形态都既具有民族性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中国意识形态也毫不例外地具有这两个特征。

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变革,中国的意识形态经历了一个理论选择和重新创造的过程。决定这一过程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中国对社会革命道路的选择,二是中国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吸收、改造方式。正是由于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由此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理论。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在这里,我们的任务不是陈述这一历史事实,而是以这一历史事实为出发点,分析这两个因素如何影响中国人的价值理念,从而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塑造中国的意识形态的。

中国对自身社会革命道路的选择是由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决定的。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由外而内、由西方而东方的过程。鸦片战争是这个过程的起点。由于这个起点,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三个特点:首先,中国是在被迫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战争中步入现代化的,这使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充满了暴力,并且是以丧失中国的部分主权为代价的,为此,以战争的方式解决中国的主权问题就成为中国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其次,由第一个特点所决定,中国的现代化始终是在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碰撞与融合中发展起来的,于是,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通过单一的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实现,必然表现为融生产方式的变革与文化传统的更替于一体的复杂过程,既然如此,那么,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如何借鉴西方的文明成果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必须面对的问题;其三,在时间上,中国的现代化发生于资本主义革命完成时期。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殖民地而产生的矛盾空前激化,终于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西方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由西方扩展到东方。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西方背景。这一背景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即中国可以根据自

身的特点,借助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在一个更高的文明形态上创造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三个特点主要从两个方面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其一,确立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目的。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入侵中国,迫使中国与其缔结条约,获得中国的领土、交通、港口的通商权。这一行为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迫使中国人转而接受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运动产生出来的,其内涵是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国家的政治权利。这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概念。中国人一旦接受这一国家观念,就把它运用到自己的革命实践之中,自觉地把争取民族国家独立作为中国革命的直接目的。由于国家观念的转变、革命目的的确立,中国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就获得了时代的内容,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其二,由中国革命的西方背景所决定,中国革命必须同时完成变革中国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两个任务,中国革命必须加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列,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以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革命的形式上,通过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解决中国的国家主权问题,继而领导中国走上自身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曾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概括了中国革命的这一特点。他指出,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先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解决国家主权和民主革命的问题,然后再发展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从国家性质看,中国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2]p.675}中国革命的这两个特点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确立以现代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而体现这种价值理念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不仅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同时,还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理论论战的成果。20-30年代,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新儒学和自由主义展开了激烈的理论论战。这场论战实质,与其说是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不如说是建构中国的新文化、新思想的过程。因为中国现代化的实际问题不可能通过思想论战来解决,只能通过战争的实践来解决,思想的论战只能解决思想的问题,即解决中国现代化的理念问题。这场论战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儒学和自由主义各持一端,新儒学主张“中体西用”,自由主义则主张全盘西化,尽管如此,两者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都主张通过意识和道德的变革,以改良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与这两种主张不同,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以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并不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而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批判,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践和辩证法:一方面以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践和辩证法思想的重新阐释,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使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另一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使马克思主义融入了中国文化,成为了中国的新文化、新理念。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工作,马克思主义比之新儒学和自由主义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现实矛盾,更合理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建构起有机的意识形态理论;相比之下,新儒学和自由主义建构的意识形态理论则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通过考察中国对自身社会革命道路的选择和20世纪20-30年代的中西思想论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意识形态的民族性特征不是一开始就被意识到的,而是在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中

确立起来的,并且经历了一个民族哲学的更新过程。这个过程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相联系的,是中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理念。这一价值理念是我们今天创造适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意识形态的基础和起点。

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与中国现实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再度对外开放,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标志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绝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的变革活动,而是一个从经济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整体性的社会变革运动。其中,意识形态是这个变革运动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又是这个变革运动的最高表现,因此,分析当前中国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就是对中国现实的认识。

概括起来,当前中国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意识形态中的计划观念与市场观念的冲突;二是意识形态中的民族国家概念与全球化、现代化观念之间的冲突。从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分析,这两个矛盾实质上体现的是意识形态的理论功能与价值功能之间的矛盾。

从第一个矛盾看,中国意识形态中的民族国家观念是以国家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这种价值理念与计划经济恰当地结合到一起,获得了意识形态的理论功能与价值功能的一致性。但是,这种价值理念却是与市场经济的原则相矛盾的。市场经济以个体性为存在的基础,它的健康发展需要以保障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保证个体的发展为前提。因此,当中国在经济领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就从对国家与集体的依赖转向了对自身利益和权利的要求。而当原有的意识形态理论不能更新,不能满足这一价值诉求的时候,意识形态的理论功能就与价值功能脱节,甚至发生分裂和形成极端的对立。这时,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就会引导人们去选择其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新儒学和自由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获得了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

从第二个矛盾看,中国意识形态中的民族国家概念是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相联系的,代表了当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而,它有效地抵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全球化运动和现代化思潮的发展,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逐渐把全球化和现代化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以此把西方的价值伦理理念说成是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普遍价值理念,从而实现西方对东方的统治。中国在对西方世界的经济开放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一意识形态的影响,于是,中国的民族价值观念与全球普遍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再次呈现出来,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研究的重大主题。

上述两个矛盾反映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有两大缺陷:其一,没有概括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容,缺乏市场经济的理念,因而,没有结合当下的中国实践,从理论上解决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国家发展与个体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二,只限于对宏观领域的社会结构的描述,没有深入到微观领域的文化研究,既没有对市场与个体价值选择的辩证关系作深刻的理论分析,也没有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展开有力的文化批判。由于这两大缺陷,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显得不再适合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地位必然被取代。这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它是对计划经济的扬弃,因而在人们的活动方式上、思想观念上,必然保留计划经济中的合理内容。中国社会改革的问题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就现实而论,中国社会的改革提出了三个重大问题:其一,公共秩序与个体发展的关系问题。当代中国社会变革暴露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在公共领域中,只建立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管理机构和法则,却没有建立保护个体发展的管理机构和法则。个体的利

益、个体发展的环境以及个体的信用体系均无必要的机构来保证或限制。这一缺陷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时代并不会影响到全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主体是国家和民族,个体的利益和发展被看作是从属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的,两者是一致的,准确地说,是同一的,所以,国家顺理成章地把个体的利益和个体的行为纳入到国家发展的计划之中,从而实现了对个体的有效管理。但是,市场经济体制是以个体性为存在的基础。为了保证社会中每一个个性的发展,它要求在公共领域中有保护和管理个体的机构和相应的法规。这是建立当代社会信用体系的前提性条件,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健康发展的有效保证。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就暴露了它的缺陷。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本来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却一直没有实际地提出这一问题,更谈不上有效的解决了。于是,个体成为国家管理中的一块空白地。一方面是国家无法管理个体,自然也无法保护个体利益;另一方面个体脱离了国家的管理,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却又因其失去了社会的依托,而难以进入公共领域,与国家和社会的其他个体进行有效的协调,从而陷入了发展的困境。这就是当前公共领域与个体相互分裂的状况。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给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的负面影响,而且也使个体难以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管理陷入无序状态。可见,建立包括个体发展内容的公共领域、有效地协调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加强国家对个体的管理,是中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其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问题。当前,中国难以重建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遍存在着一种把市场经济与政府作用对立起来,把个体的发展绝对化,以个体发展否定政府作用的观点。这种观点对国家作用的认识还停留在19世纪上半叶国家与市民社会对立的水平上。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国家的职能已经由政治统治扩展到社会经济管理、意识形态的控制等各个领域,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尤其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厘清和重新规定政府职能和作用,明确政府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和如何起作用。其三,社会变革的复杂性。由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前提所决定,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绝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变革问题,在更深刻的层次上,还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复杂联系,包括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问题。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解决了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却没有解决中国家庭、个体以及价值观念的现代化问题;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提出了家庭、个体及价值观念的现代化问题,却又在完全否定、抛弃计划经济体制成果的导向中找不到家庭、个体及价值观念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和保证,从而转向了传统文化。于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政治和经济的宏观革命与日常生活领域的微观革命的不平衡发展,这些矛盾和问题交织一起,加速了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使中国的社会变革呈现出一个十分复杂的格局。而由这种复杂格局所造成的种种假象又造成了人们认识的复杂性。比如,本来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却被社会普遍理解为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矛盾,本来应该在保留计划经济体制的政治革命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家庭、个体与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却被社会普遍理解为政治革命是家庭、个体与价值观念现代化的障碍,把政治当作非现代化的因素,排除于当代的现代化过程之外。这就是当代中国出现非政治化倾向的根源。当然,这种种认识上的假象又加深了观念与现实的冲突。中国社会变革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历史地看待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发现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合理之处与不足之处,以建立中国社会变革的自觉意识,而不是一味地否定计划经济体制,把一切不合理的东西都归于计划经济体制,从而盲目地、经验地摸索中国社会变革的道路。如果我们的社会变革长期停留在盲目的、经验摸索的水平上,那么,中国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以上三个重大问题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中国社会变革与计划经济文化之间的某种联系。由于这种联系的存在,中国意识形态的创造不能也不可能完全否定和抛弃先前的传统,而必须是对先前传统的更新和发展。

此外,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向。中国是在西方社

会主义运动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尽管如此,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与西方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绝不相同:西方社会主义是从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批判中产生出来的,它所经历的是一个由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的过程,因此,控制、直至消灭市场经济,是西方社会主义的目标与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不按照这一思路来理解社会主义及其未来;与西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同,中国社会主义产生于对封建主义的改造,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它经历的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而市场经济的过程。由于这一区别,中国既不能简单地搬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亦不能简单地运用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成果,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创造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的意识形态既不能退回到传统的儒学价值理念,也不能简单地运用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而是应该从解决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矛盾入手,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开展微观领域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从而更新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使其成为有机意识形态。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挑战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创新带来了契机。这一挑战展示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从而表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微观世界的文化革命。由于这场革命,意识形态不再是悬置于基础之上、作为反映形式的抽象知识理论,而是深入人的现实生活的自我创造活动。由此决定,创新中国的意识形态绝不是附着在市场经济建设表面的东西,而是市场经济建设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并且是引导中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方面。

责任编辑:潭月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Ideology and Today's China

HE Ping

Abstract: Ideology has theoretical and valuable function. Depending its valuable function, Ideology obtains its characters of nationality and times. Since 1990s, as market economy has given the challenge to the old value concepts, ideological valuable function contradicts its theoretical function. This contradiction presents that china is undergoing the culture revolution in microcosm, and also becomes the moment that Marxist philosophy develops and ideology is recreated.

Key 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Ideology; Market Economy; Today's China